

# 绪 论

当今时代，媒介本身衍生的话语体系已盘根错节地深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的话语体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个层面。话语体系的改变，意味着人类思维和社会观念的相应变化。事实上，今日的媒介早已参与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近些年来，随着数字媒介的渐渐兴盛，社交行为的日益频繁以及社会关系的逐步紧密，口语在人们的生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地理范围上看，技术的发展缩小了人际交往的距离，人类社交活动的辐射面积骤然增大，口语的日常使用频率逐步增加；从时空范围来看，移动互联网的兴盛，使口语的传播伸向了无限多的可能区域，口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交际功用并拓展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口语的相关研究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口语，不论是初民社会的“口头遗存”，抑或是移动互联媒介中的“次生口语文化”形态，还是新媒介技术下数字口语文化，都内涵于人类意识的思维与价值，外延于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今时今日，数字媒介话语中的口语化现象日益凸显，并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日常语言、交流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因而亟须加以重视和研究。

## 一、“活的语言”：数字媒介口语

### 1. 数字媒介话语的口语化特征

事实上，有关口语化的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就开始进入人文学科研究的视野。人们认为，“口语化”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的维度，它应该拥有更广阔的学科视野。它来源于初民部落的组建，发端于个人意识的觉醒，它应该是人文学科有关社会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起初，这些研究更多集中在新闻报道的“口语化”现象中，研究认为媒介话语占据社会公共话语的重要地位，其突出的口语化风格值得剖析。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推进，移动终端的全民普及，微信、微博等工具的风靡兴盛，人们获取信息、交流的手段也被其逐渐垄断，数字媒介话语日益凸显的口语化特征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研究亟须提上日程。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个现象，比如语言学者们对口语词汇的认识也在逐渐更新。如今，“丰富多彩的口语会话环境，为词汇的动态话语功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舞台”<sup>①</sup>，“口语基本词汇几乎涵盖了全部词类，既有对客观物体、事件、性质进行静态描述的实词，也有表达动态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各类虚词和话语标记。”<sup>②</sup>与此同时，传播学科也开始了对这个特征的研究。

美国知名传播学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兹兹·帕帕克瑞斯（Zizi Papacharissi）曾在2015年发表文章指出，新媒介语言，尤其那些受大数据等科技影响的当下媒介应用语言，也被称为数字化口语，介于原生口语文化与次生口语文化之间，兼具人性与主观性。与书面语相比，数字媒介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口语化的回归。而数字媒介等新兴

① 王慧：《日常口语中的基本词汇》，《中国语文》，2011年第5期。

② 王慧：《日常口语中的基本词汇》，《中国语文》，2011年第5期。

技术在影响语言使用的同时，也在默默改变着人类的叙事方式和知识传承。<sup>①</sup> 许许多多的社交软件不断登场，视频、图片在各种交流中都流溢出口语化的表征。索弗（Soffer）的研究就聚焦于时下新兴的视频新媒体——风靡美国的色拉布（snapchat）。他指出，snapchat 等视频新媒体在语言的应用中，就体现出了鲜明的口语化风格。其一，语言被录入视频之中，视频播出时随即消失。其二，语言被说出之后并无文字记录，因此并不具备书面传播传递、储存知识的特点。<sup>②</sup> 尔后，例如推特、微信等有声语言输送软件的全民普及，更是将口语化这一趋势推上媒介话语研究热点。斯莱戈（Sligo）等学者在通过对 88 名年轻人的用语观察时发现，作为口语化特征的缩略语等形式，这些媒介语言的样式不仅体现在观察样本的新媒体书写用语（短信、博客和推特）中，更体现在年轻人通过新媒体而进行的互相交流中。同时，新媒体中所产生的大量有声语言的交流也体现了口语化的特征。<sup>③</sup>

对于国内而言，“高价值内涵”和“轻量化输出”是年轻用户对移动终端的语言呈现方式的重要诉求，在《中国自媒体内容创业报告：你朋友圈里原来这些文章最火》中，研究人员认为移动终端用户将更多的碎片化时间用在轻松随性、具备新叙事风格和强烈个性形象的内容产品中，同时提出微信朋友圈语言全新叙事方式的变革：“（1）一切有门槛的阅读，都在被自媒体消解；（2）专业词汇，被口语化替代；（3）严肃的论证链接，被犀利的风格化表态替代；（4）传统的文体架构，被丰富的图、文、视频混排替代；（5）严谨的内容产品依然有价

---

① Papacharissi, Z. (2015).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impossible gravitas of knowledge: Big Data and the makings of a digital oral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7), 1095-1100.

② Soffer, O. (2016). *The oral paradigm and Snapchat*. *Social Media+ Society*, 2(3), 1-4.

③ Sligo, F., Tilley, E., Murray, N., & Comrie, M. (2015). *Young adult literacy learners describe the text-orality nexus*. *Text & Talk*, 35(1), 101-121.

值空间，但大众更多的消费时间被另一种大不相同的形态占据——内容消费开始变得轻快、扁平和离散。”<sup>①</sup>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以社交媒介为代表的诸如“微信”“微博”“Facebook（脸书）”这些移动 APP 应用的风靡乃至普及，不仅带来了新的叙事风格与语言革命，更关键的是它还催生了当下主流媒介口语化特征的成熟。

## 2. 数字媒介话语剧变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

一直以来，媒介的发展是以人类的物质生活形态为具体表现的，而媒介的每一次剧变势必会带来文明的裂变。人们由最初的原生口语文化发展到以文字占主导的书面文化；可如今，文明的车碾驶来，全新一代的“地球人”正在麦克卢汉的“预言”下进入了另一种“初始状态”：次生口语文化。这里，数字媒介正成为这个时代的“新贵”，文字本身所裹挟的线性秩序正在被消解，口语思维带着原始部落的力量再次登场，浓墨重彩地结合到新的媒介时代中来。

但是，无论媒介如何更迭，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在经历这样的感受：对数字媒介的恐慌，对旧媒介的依恋。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新环境，汽车、铁路、收音机和飞机都是如此。任何新技术都要改变人的整个环境，并且包裹和包容老的环境。而新环境随时都在用老的环境创造新的物品原型和新的艺术形式。荷兰语言学家范·戴克（Van Dijk）曾在著作中表述：“媒介早已参与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而特定社会群体也利用媒介进行资源配置的倾斜。”<sup>②</sup> 而当前现实是，数字媒介话语中的口语化进程日益凸显，并深刻影响到日常语言、思维，

① 企鹅智库，2016，《中国自媒体内容创业数据及趋势报告》：<http://tech.qq.com>。

② Van Dijk, T. A. (1996). *Discourse, power and access*. In *Caldas-Coulthard, C. R. & Coulthard, M.,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bingdon-Thames, Routledge.

以及交流，我们不得不承认，口语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今非昔比，文学批评与文艺研究、语言学研究正在面对更多的任务与挑战。

客观来说，传播学研究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因此，媒介话语的问题也需要多学科、多取向的视角分析。“大众传播的研究应当是社会与行为科学以及人文学知识整体的一部分，是对人类社会的象征再现和这一再现的生产过程及其对人的心理、行为之影响的研究。”<sup>①</sup>一直以来，关于媒介的研究一般分为三个方面：媒介生产、媒介内容、媒介效果。而媒介话语的分析属于媒介内容，也就是媒介文本的研究。这些文本的载体——数字媒介，已然在无形之中塑造了新的话语形式。目前，我们的研究遇到了这样的现状：这些发生在新社交媒体中轻书写重交际的口语化现象，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对于媒介话语的口语研究，它的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动力、传播意识等都亟待解决；同时还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追问当代传播为什么会发生口语化，以及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种口语化。这些问题，已然不只是传播学科的困惑，更是文学研究必须直面的难题。因为，媒介的更迭所牵动的文学层面的载体变化，而文学本身也会产生改变。所以，对于文学而言，研究数字媒介话语也为自身开拓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与理论版图。据此现实，只有将传播学、文艺学两个主流学科的深度结合才能完成新时期、新环境、新文明等数层挑战下的任务研究。

### 3. 数字媒介话语口语化研究——文学传播的新尝试

文学传播学，作为一门正在兴起的交叉学科，是历史观与现实条件的必然指向。客观来看，文学传播是一个动态的信息系统，“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sup>②</sup>。从广义上讲，文学传播可以

①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4页。

②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5页。

涵盖两个层次的活动。其一，是指文学创作主体与文学接受主体的整个信息的传播过程；其二，是指媒介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文学活动过程。本书认为，文学传播学不应该只是基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角度，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就提出“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sup>①</sup>在语言学的概念中，“话语”也用来指口头对话的延伸部分，以便与书写“文本”相对照。因此，在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口头语言的分析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口语活动的变迁正是一部动态的文学传播发展史。

口语研究一般分三个导向：交际、表达、传播。一直以来，无论语言学还是文艺理论学对于书面语的重视要远远超过口头语言。直到近些年，随着电子媒介的渐渐兴盛，社交行为的日益频繁以及社交关系的逐步紧密，口语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开始上演重要角色。从地理范围上说，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与范围，于是人们的活动辐射面积骤然增大，口语的日常使用概率铺天盖地；从时空范围来说，线上移动互联的兴盛，使口语的传播尺度伸向了更多无限的可能区域，口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交际功用并纵横各个领域。口语的相关研究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口语是人类社会维系的黏合剂，口语赋予人社会属性，同时作为纽带联合社会因素。徐树华（2012）从学科类别的角度将口语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导向：“一是口语交际研究，基本属于语用学导向的研究；二是口语表达研究，基本属于艺术学导向的研究；三是口语传播研究，基本属于传播学导向的研究。三者在历史上学缘关系密切，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细化，各有侧重，呈现

---

<sup>①</sup>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1页。

出不同的研究特色。”<sup>①</sup>因此，本书论题的研究运用了多学科、多理论交叉的方法，包括史诗研究（口头程式理论）、媒介环境学研究、大众传播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等学术视野。

文学和媒介的意识形态性问题，一直是文艺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的学者对此问题比较关注，不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还是大众传播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深入探讨，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以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传播学极为看重传播的意识形态性。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似乎尚未形成。

事实上，深入探讨口语传播急需集合这些学科的交叉研究作为背景理论，这对数字媒介时代的传播研究有极强的社会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

## 二、已有的研究综述

沃尔特·翁（Walter Ong）提到，“20世纪末，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为媒介环境学派，组建了媒介环境学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sup>②</sup>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之后的传播学，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占据了半壁江山，并主导了后来传播学的走向。这个学科的优势在于善于引入多种模式研究，接受各个学科的视角，并做出多种融合探索。一直以来，国内传播学的研究重点多为大众传播，而20世纪80年代从西

① 徐树华：《论口语研究的三种导向：交际、表达、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9期。

②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页。

方世界引进的传播学正是美国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证主义研究盛行的那些学派，这些学派正是以经验和批判著称的。但是这种视角并不能完全主导一个学科半个世纪甚至是更久，因为伴随技术的变革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些理论已不能完全解决现实问题。于是，各国传播学都在寻找新的学科力量。直到 2000 年以后，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第三学派的出现，逐渐受到世人瞩目。而国内也未逃过旧视角范式、内容陈积等所带来的学科危机，于是，国内传播学界开始关注正在突起的力量：媒介环境学。作为将媒介环境学大量书籍译介并引入国内的学者何道宽，他对媒介环境学的特点是如此分析的：“（1）具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关注技术、环境、媒介、知识、传播、文明的演进，跨度大；（2）主张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媒介论，关注重点是媒介而不是狭隘的媒体；（3）重视媒介长效而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4）怀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sup>①</sup>国内传播学在口语传播方面的研究暂时薄弱，基本以大众传播为研究主流。大众传播一直追寻以量化研究为主要手段，以传播效果为研究目的。而口语传播，事实上是一种很难量化的事物。“社会历史学家里哈德·柯斯特兰涅兹（Rihard Kostelanetz）争辩说：‘麦克卢汉头脑最非凡的品格，是他能够看透别人只能看见数据或什么也看不见的东西。他告诉我们如何量化过去无法计量的现象。’”<sup>②</sup>这告诉我们，解决口语传播的问题，可以从媒介环境学的视域寻找出路。

口语传播学是媒介环境学的延续与发展。“口语传播学探讨的是一种话语方式，即研究人们如何最恰当地利用口语形式以及其他副语言

①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 2 页。

②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 356 页。

形态来影响受众，如何使人在思想、观念、行为、行动上产生改变。”<sup>①</sup>关于“口语”的说法，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其实，关于“口语是什么”的问题本身并不值得探讨，而关于口语的价值属性这个问题却十分值得探究。自媒介环境理论出现之前，对口语的认知多停留在“口语是一种传播行为”，真正做到深层研究的还应归于麦克卢汉对口语的认识：“口语是最早的技术，凭借这一技术，人类用一种新的方法去摆脱环境以便于掌握环境。”<sup>②</sup>其同时代的媒介学者伊尼斯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媒介涵盖一切技术，口语首先是一种媒介。后来，马文·波斯曼（Marvin Potzmann）在《技术垄断》中也表示“语言就是技术”此类的看法。而到沃尔特·翁这里，口语是否为技术就变得比较隐晦。首先，沃尔特对口语的描述都是在与书面语的对比中进行的，文字作为书面语的载体是物质技术的，而口语发生于并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时期，是人向部落群体化的传播需求中自然发生的，并不能完全称为技术。口语有人性，文字有物性。但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却并不认同，他指出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的文字，皆是人的产物、是人的延伸，故而都是技术。正是通过这些对“口语”媒介的研究，更多的理论学家开始认识到，口语已经日益充斥在新的媒介话语中，并拥有重要的位置：“巴伦（N.Baron）认为电子邮件与口语相似的原因是写作越来越口语化，部分原因出于有意识的方法决定，部分原因是我们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社会态度发生了改变。”<sup>③</sup>大卫·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认为，“可以把网络语言看作朝口语方向拉的书面语，

① 李亚铭，王群：《口语传播学：一个亟待建构的新学科》，《编辑之友》，2014年第7期。

② 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11页。

③ Baron, N.S. *Why email looks like speech—Proofreading, pedagogy and public face*[C]. in eds. J. Aitchison & D.M. Lewis, London: Routledge, 2003: 92// 曹进：《网络语言传播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5页。

而不是书面记录下来的口语”。<sup>①</sup>

整个媒介环境学派发展已经走过了三代人的历程，但有关口语回归的研究，源自第二代学者中沃尔特·翁（Walter Ong）所著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一书。国内学者何道宽称此书“彻底破解了荷马史诗和口语的文化之谜”。作者沃尔特·翁在文中不只详尽介绍了史诗学家们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还见地独到地区分了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两极性，最重要的是沃尔特将因“电子和数字时代”的到来而以新的形态复活的口语文化创造性地命名为“次生口语文化”，以及与其区分的“原生口语文化”，并提出了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他认为原生口语文化就是“不知道文字是何物的文化”，而次生口语文化是“电话、电视、广播产生的文化”。这是从文化与媒介史的角度区分的，同时，两者在心态与意识上也是不同的。原书作者认为次生口语文化拥有强大的解释力，它不止可以还原那些遗存在高科技时代中的原生口语，同时还可以更好地解释“地球村”和“重新部落化”时代。而这一点在本书看来正是开辟了媒介环境学的新视野。

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表明此书的重点在于研究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不同的文化心态问题，但在本书看来，此书的贡献有三：其一，面对前人对口语词技术化争论不休时，独具慧眼地将争议拉到了口语本身的发展能力，即口头程式理论中所提到的“套语”能力。其二，面对媒介环境学对当前电子信息时代出现了轻书写重交际的语言嘈杂现象混沌不明时，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电子信息时代的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并延续了原生口语文化的部分遗产。其三，在媒介环境学面对社交媒介所带来的“受众如此之深广、传播如此之迅捷”的生态挑战时，他指明了通过口语传播的视角来研究新型媒介的

---

<sup>①</sup> Crystal, D.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79/ 曹进:《网络语言传播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6页。